



冯绍雷 相蓝欣

主 编

转型理论与 俄罗斯政治改革

转
型
时
代

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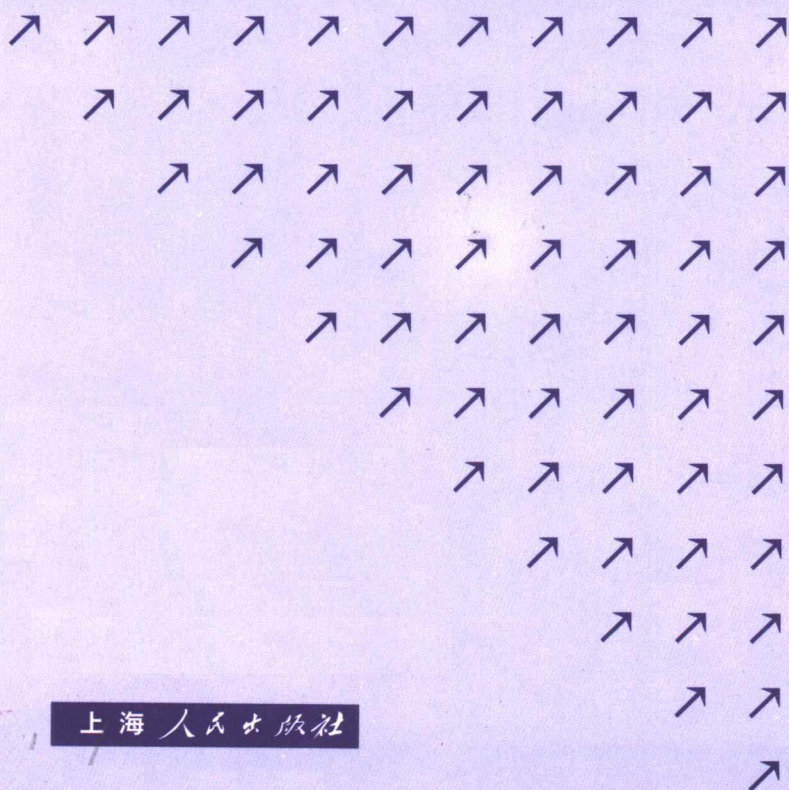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冯绍雷 相蓝欣

主 编

转型理论与 俄罗斯政治改革



转
型
时
代

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冯绍雷,相蓝欣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转型时代丛书)

ISBN 7-208-05688-9

I. 转... II. ①冯...②相... III.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俄罗斯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5416 号

责任编辑 范蔚文

封面装帧 傅惟本

• 转型时代丛书 •

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

冯绍雷 相蓝欣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469,000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688-9/D·980

定价 38.00 元

总序

冯绍雷

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这十四年来人们关于苏联解体,特别是尔后关于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有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争论中的各派意见无法一致,但争论的主题却相当鲜明,那就是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向何处去。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表达的话,人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各国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社会转型,具有怎样的起因与动力,将如何起步,并遵循何种路径,还有对迄今为止的转型过程及其结果作出何种评价,以及给予怎样的前瞻性估计。

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这样一场社会转型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首先是因为这一宏大的社会过程是发生在前苏联(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多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前超级大国。20 世纪的 80 年代中期,当精力旺盛的新一代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躊躇满志地入主克里姆林宫,并掀起一场天翻地覆的改革运动时,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时过六年,像苏联这样的庞然大物居然会土崩瓦解于顷刻之间。苏联的解体带来的是冷战格局的终结,并由此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复杂变化,迄今仍未止息。

何以一国之中的制度变迁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人们不得不从催生剧变的制度变迁本身寻找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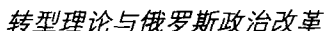
纵观世界历史进程,人们发现在前苏联地区所发生的变化有着更为广泛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始,也即早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十年之前,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及希腊等国率先发生了从军人独裁政权向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政治转变;80年代,与南部欧洲有着密切传统关系的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发生类似的变动;稍后,东亚地区也不同程度出现了从强人政治向选举民主制度和开放式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到20世纪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东欧地区在多年进化式改革所积累的基础上首先发生政治剧变,1991年底,前超级大国苏联在若干年摇摇摆摆的改革进程之后瞬息解体。虽然,对于上述近三十年来发生在各地区各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进程究竟是偶然的相似,或是浅表的简单模仿,还是确实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尚需作深入的认真研究,但是几乎可以确认的一个事实是,当今世界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正以人们所感知的、或者尚未感知的某种深度与广度超越以往人类历史的类似进程。就其广度而言,人类历史上几乎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各大地区几乎是同步出现的,而且是广泛发生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就其深度而言,工业革命以来,源于西方的民主与市场制度借助于现代传播手段得以扩展,几乎是第一次与所有各大文明地区的传统同时发生如此深入的交融与冲撞,其间所发生的对人类东西方各种各样的传统的反思和创新,所引发的各种物质与观念力量在竞争中的分化、重组,及其所迸发的能量和所产生的辐射力实在是举世所罕见的。

二

与以往任何时期的国际剧变相比较,冷战结束以来的各国内部转型与国际变化大体是在和平方式之下进行,而不似此前任何一次,国际变局非得在兵戎相见之下方告完成。而越是以和平方式推进的社会变迁,便越是显示出推动这种变迁诸种动因所具有的前所未见的深刻性和影响力。这里所指的动因既包含着人类追求公平、自由与幸福的不懈精神,也包含着对于与人类成长进步与生俱来的文明多样性的越来越多的尊重与肯定。与以往任何时期的国际变局相比较的另一个不同之处,乃是席卷整个世界的所谓全球化进程。这一进程不光是出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推动和物质利益的需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广大非西方世界各民族与多区域的振兴目标与实际需求相互之间有着某种呼应,从而形成了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要求改革传统体制、改变传统社会行为规则的摧枯拉朽般的革命式演进。全球化进程与和平方式的社会转型这两者间的相辅相成不仅是为当前国际变局奠定基调,而且使得国内体制变迁与国际社会转型之间正在产生越来越直接,同时也越来越复杂的相互关联性。

就国内社会而言,当今世界的这场深刻而又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制度与社会转型,首先导致了既定体制框架的根本性的变迁。无论是文明古国,还是年轻民族,也无论是处于欧亚大陆的心脏还是远在大洋的彼岸,改革之风所到之处,无不为之推陈出新推波助澜。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的强劲动力,既出自于精英阶层在全球化推动之下要求思想解放和探索民族自强道路的吁求,也来自与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要求改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状态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远不只是一种管理模式的变化,它激发起的是人们的生活与生存方式的变化,是对各类制度



正表现出巨大兴趣,且备受关注的一些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这些领域与方向尽管还未具备完备系统的学科知识的范畴与逻辑体系,研究方法也有待成熟,但却是针对着当下转型研究中所迫切需要着手诠释的重大命题,这里包括革命研究、精英研究、帝国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现代化问题研究。尽管当代国际学界转型研究中各类理论方法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还是大有可借鉴的学术成果与理论见解。事实上,我国的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四

从制度变迁所发生的各个领域的情况来观察、记录与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在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外交各个领域内社会转型的主要趋势和发生的重要问题,将有助于对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认识与把握。

政治领域的变化应该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制度变迁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内容。其中包含着俄罗斯政治变化的动因与性质、基本的结构及其未来的趋向这样一些主要问题的讨论。

当我们在观察自苏联到俄罗斯那一场迅速而杂乱无章的政治变化的动因时,会发现这是一个历史惯性与现实政治博弈、理想主义者的改革抱负和政治投机家的暗中谋算,以及内部政治变化与国际力量竞争等诸多因素贯穿综合而成的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以笔者 80 年代中期在前苏联地区的实地考察,这是一个传统体制运行久已疲惫,整个社会充满惰性,但同时又期盼着变革奇迹来临的时期。虽然戈尔巴乔夫就任之初并没有立即以激进的政治改革作为激发与动员前苏联社会创新力量的杠杆,但是,几百年来一直以政治运行为主线的俄苏社会,一旦治表式的经济调整政策失败,便立即转向期待通过政治生活重组来取得对传统体制的突破。在党内改革力量、知识分子、野心家和投机家们所形成的合力的鼓动与怂恿之下,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还颇有起色的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迅速地转化为取消共产党自身领导地位的激进之举。党的溃败显然成为这个转型中的大国无法自控的关键步骤。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前主任 J. 米勒认为,前苏联的解体是一种“例外”,即从执政精英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从前苏联体制所尚存的运行功能,包括作为超级大国所拥有的资源而言,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远不至于即刻崩溃。可见,一旦执政精英的战略失误,一个超级大国在当代条件下的政治变动便会具有远远超出理论解释与预判能力的超常规性。

相当引人注目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基本特征。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再到普京,很难断言,这三位政治家及其所代表的精英阶层乃至俄罗斯人民追求民主的理念全然是一场闹剧。直到今天,在与乔治·W. 布什总统第二任期之初于布拉迪斯拉发的首次面晤之后,普京仍然宣称,俄罗斯不打算搞任何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

俄罗斯民主认同于所有源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民主价值标准。他随后补充道,只不过是一般民主原则的具体贯彻实施仍须视俄罗斯的不同具体情况而定夺。^①然而,国际学界晚近的研究依然倾向于使用“委任式民主”这样的概念,来评判俄罗斯当代的政治。这一概念认为,委任民主是代议民主和权威主义的某种混合,既从前者继承了自由竞选的形式,又从后者承袭了巩固权力的非民主方式。这样一种“委任式民主”,使得通过选举的形式取得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家,具有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化身的地位,高居于政党和各种组织集团之上,但同时仅仅维持一种较低水平的横向负责模式,即往往倾向于在不同程度上对政治系统内的政党、议会、法院,包括独立媒体等各种民主设施与机制有所限制。^②

从俄罗斯取得独立以来的政治结构状态来看,似乎也与上述概念的指向有所吻合。首先是,宪法所规定的俄罗斯总统对于议会和司法系统而言实际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俄罗斯目前的政党制度中,总统的这种权力又因为实际上获得了议会多数党的支持,而具有超党派的面目,从而使得总统的权力可以超越代议机构。另一方面,相当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无执政党的多党体制”,又使得各个政党基本上难以聚集力量来与国家的行政决策权力相抗衡。除此之外的问题是:其一,俄罗斯千百年传统中疏于法制的传统,使得任何真正的法制建设都步履艰难;而90年代中期在自由主义观念横行于俄罗斯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的迷信换来的却是“独立后”的司法体系难以自拔的腐败。其二,在高举民族独立旗帜下取得独立的俄罗斯,在90年代以来长期不得不奉行一个“可协商性的联邦制度”来维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依靠中央与地方主权单位之间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来保持联邦制的形式上的存在。但是两次车臣战争以及90年代中期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终于使普京下决心重新在联邦制结构中回归中央权力。上述的结构性因素表明了一个相对集权的或者叫做重新中央集权化的过程正在出现。

新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政治发展在西方,包括在俄媒体上被冠之以“可管理的民主”的标签。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这一词语本身还是比较确切地反映了俄罗斯转型政治发展的逻辑及其演进趋势。一个缺乏西方式市民社会传统的欧亚大国在模仿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时,势必会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曲折与反复。一个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而尚未形成充分的社会利益集团分化的选民结构,是难以在短时期内形成真正的多党制基础的。同样,一个虽然具有反对派传统,但是在长期高压统治下,在政治权力与反对派之间并不具备良性互动的传统习惯的条件下,俄罗斯“媒体自由”的较初始状态看来也将迁延时日。

① 普京总统在布拉迪斯拉发会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 <http://www.strana.ru>, 2005年2月24日。

② 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 Baltimore: J.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4—108.

五

与俄罗斯政治转型紧密相关联的是俄罗斯的经济转型。

在事过十多年之后,再来反思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发生,其前因后果都要清晰得多。然而,在当时,为什么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而不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改革成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起点,用曾经也是1992年“休克疗法”时政府核心梯队中人,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席私人经济顾问的安·尼·伊拉里奥诺夫的话来说,这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也是多种力量博弈所导致的一个结局。^①

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逻辑过程来看,以激进方式开始实施转型是俄罗斯多年来未见成效的渐进改革的逻辑发展。“休克疗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时内无供应、外无援助的危机条件下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公共选择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休克疗法”的出台是当时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为获取政治权力而推出的一个政治工具。^②作为一系列改革方案设计者的俄罗斯前任经济部长叶甫盖尼·雅辛曾经公开证实,“休克疗法”的出台更多是当时主要政治领导人为打击对手、取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而非一个在政策上和理论上深思熟虑的结果。^③

俄罗斯经济改革之所以取法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还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思潮,而时值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家们普遍地失望于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框架下各国改革进程的停滞不前,甚至在理论上也普遍怀疑市场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成为前苏东学界一时之圭臬。除此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在给予经济援助的诱惑之下大力推广由宏观经济稳定、自由化与私有化的三位一体的激进改革模式。并且,从1989年到1990年,波兰在杰弗里·萨克斯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取得部分成功,也大大刺激了俄罗斯朝野对于通过“休克疗法”能够迅速摆脱危机的预期。

虽然,对于俄罗斯推行激进式经济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之后的结局仍有不同评价,但显然多数意见持否定态度。相当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学者在“休克疗法”实施数年之后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一片否定之词,诸如以大量使用的“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封建割据资本主义”、“犯罪资本主义”以及“虚幻市场经济”等词汇来批评俄罗斯经济转型。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休克疗法”方案的鼓吹者、设计者

① [俄]安·尼·伊拉里奥诺夫 2003 年 10 月在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讲演。

② Vladimir Man(1996),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1985—1994*, Moscow, pp. 49—64.

③ Ясин Е.Г. Перех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02.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与实施者,诸如大名鼎鼎的杰弗里·萨克斯、亚诺什·科尔奈,包括叶甫盖尼·雅辛等人都在十余年之后,在不同程度上公开检讨了“休克疗法”式改革的弊端。

十余年来经济转型留给人们思考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其一,关于体制转型中的增长与结构的关系。自1999年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经济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进入了稳步增长的第六个年头。但对当年“休克疗法”的基本评价仍未扭转,即虽然“休克疗法”实施之后,苏联式计划体制确实已经不可能再卷土重来,但是,“休克疗法”下导致的转型至多仅提供了极小一部分的增长动力。关键的问题是,制约俄罗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仍将基本上通过出售战略物资和能源原材料维持增长这一点,依然显示了俄罗斯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增长有赖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

其二,关于民主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改革之初,俄罗斯改革家们信奉“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的法则,曾经憧憬在短时间里能够建立既有民主又有市场的发展模式,但转型研究的事实表明,尽管民主与市场的相互支持在欧美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总体而言已经得到了证实,但在广大的非欧美工业文明地区,民主与市场并不一定呈正相关关系。政治市场上的博弈结果往往会导致选择一个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制度。这种干扰性表现在市场制度形成过程中国家有效干预的缺位,非正式规范,特别是腐败的泛滥,再加上分配领域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近年来,严重困扰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的“尤科斯事件”,反映的不光是俄罗斯政商关系的持续紧张,而且也是对天真幼稚的“市场与民主天然联系论”的一个惩罚。

其三,关于一般西方经济学原则与俄罗斯民族经济思想的关系。近年来,阿巴尔金院士所发起的关于是否存在俄罗斯民族经济思想的讨论曾一度激起广泛反响。反驳者认为,经济学是普世的学问,亚当·斯密、李嘉图的思想可以为人类所共有;但赞成者认为,俄罗斯特有的人文与地理环境等禀赋不可避免地形成俄罗斯特色的经济思想与经济转型模式提供依据。比如深植于俄罗斯国民灵魂的村社式的非市场经济传统在何种程度上限制着市场的发展;比如浩渺辽阔、气候恶劣的地理环境为商品交换与市场的正常发展添加了多大的超乎常人想象的障碍。至少,上述因素将导致市场运行的相当大程度的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巴尔金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范畴,他反对脱离环境、脱离社会进行静态的经济活动分析,尤其要强调作为整体的国民经济和国家的作用。俄罗斯十余年转型经济的经验,并没有绝对排斥一般西方经济学原则的理论重要性,但是,至少在实施这些理论原则时将如何保留俄罗斯特殊性的问题上,过去十余年的艰难历程已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警示。

六

就转型期的俄罗斯而言,制度变迁的空间与载体是俄罗斯社会,而俄罗斯社会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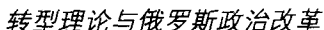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问题:第一,独立之后俄罗斯的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第二,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变化;第三,转型期俄罗斯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

与政治制度的转型相呼应,转型阶段的俄罗斯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呈现出许多令人关注的特点。随着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变迁,前苏联大包大揽式的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从养老金、医疗保险一直到老年人的交通津贴、免费住宅等等,这一切都不得不转入新的社会—市场统筹解决途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成为当前影响政治稳定、并且从长时期看也是俄罗斯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颇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问题,乃是以以前已经迅速呈现、并将在今后二三十年中进一步发展的
人口下降趋势。据估计未来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口将减少到只及2000年的59.4%。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届时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的老年人将达到41个。社会政策领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乃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家统一管理的教育模式被打破之后,如何面对教育领域的竞争格局、如何保持并适应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在上述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的背后是起于前苏联晚期的俄罗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是作为社会阶层与集团的传统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妇女、青年的状况正在变异,特别是产业工人与知识分子近于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是社会仍处于高度分化状态:一小部分暴富者和数量庞大的贫困阶层并存;中产阶级的出现虽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无论是他们的人数还是地位与能量都尚有大量争论,远不能发挥类似于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作用。普京执政以来,无论是居民平均收入还是贫富差距问题都有所遏制,但仍无法在短期内使得情况得到大幅度改善。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代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优秀人文传统的国家来说,十多年社会转型的冲击与洗礼,与其千百年所经历的风险与磨难相比还只是一个短暂的片段。虽然,在社会变革的狂飙之下,俄罗斯人的自身认同问题,以及通过哲学、史学、文学,以及语言与造型艺术所表达的精神境界与品位,已经与前苏联时期有了很大的差异,人们可以感知当代俄罗斯人在剧变后的那种失落与迷惘,以及在艰难求索中的那种痛苦与沧桑之感。但是,通过作品,通过交往,通过体味,人们也同样可以领略到有时甚至是以调侃方式表达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多样化的追求、一种不脱欧风韵味但仍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质朴与豪迈的禀性尚存于俄罗斯人中间。

简言之,从总体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讲,俄罗斯社会虽然已经转变,但尚未定型。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到平民行为,从社会组织方式到家庭伦理规范,都体现了制度变迁后俄罗斯所承受的巨大冲击。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制度转型的深入,人们认识到,俄罗斯社会与苏联社会之间乃至前苏联时期之间,仍然保持着广泛而深刻的承继性;而且无论是新老精英之间的赓续,还是反映深层认同意识的人文精神,在社会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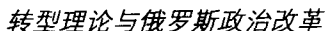
第三,转型过程中的“连续”与“中断”的相互关系问题。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其实质是希望通过与前苏联的历史一刀两断,从而获得其政治合法性。但是无论是转型前后的精英阶层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有学者以此与中国相比较,认为俄罗斯新精英阶层中有大得多的比例来自于老精英阶层),还是民间意识表现出更多与前苏联时期的难以割舍,都集中体现在自称为是前苏联的“正常公民”的普京总统身上。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转型期间的许多问题更多地是来自于前苏联时期的既定结构与惯性。

第四,转型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总结俄国历史上历次“制度引进式”的社会变革,可以发现,制度引进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者的叠合。有人认为,彼得大帝之后的“西化改革”由于叠合程度弱,因此,制度引进之后的趋异和排斥现象成为制度发展的主要路径,尔后俄国历史发展表现出一种与西方貌合神离的态势;而十月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维埃制度与传统俄罗斯制度的叠合程度较高这一原因。看来,90年代初的“第三次制度引进”,同样出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较为强烈的排斥与趋异。因此,新制度学派的观点是俄罗斯的新旧制度叠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而且是经历不断反复的时期。从俄罗斯转型的近期经历看,这样的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五,平民主义与重新中央集权化的相互关系问题。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符拉基米尔·毛 90 年代中期就曾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俄罗斯改革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平民主义崛起的结局。这不只是“不公正的改革可能导致革命”这样一种逻辑的推

① 青木昌彦：《比较分析制度》，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1—392 页。

② Grame Gill, *Democracy and Post-Communism*. Routledge, 2002, pp. 174–193.



演,而且也是从其他地区的转型实践,比如拉丁美洲地区从自由主义到平民主义的历史变迁的先例中得到印证的一个结论。如果说,平民主义现象是普京重新中央集权化措施的一个前奏与基础,那么,可以预计,在不放弃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旗帜的前提下,普京的新政将会继续在自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立场之间取得平衡。也许,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现象可以成为今天观察普京未来路线的一个出发点,即革命死了,但是革命的精神是否可以通过中央集权化的拿破仑式的调节与控制而得到保存。

最后,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问题。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对外关系发展大体上是以国内体制变迁的起落程度为标志的。90年代初,对“休克疗法”神奇功效的迷信是与对西方国家发展紧密关系的热切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90年代中期当转型陷入困境时,俄罗斯与大国间的关系立即出现变化,不仅开始批评西方,而且主动与中国发展起战略伙伴关系。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转型在经济进入持续恢复阶段的同时,政治上出现回归趋势,其实质是俄罗斯国家希望进一步取得对已被私有化的资源(特别是赖以作为发展主要源泉的能源)的重新控制。被恐怖主义、油价高涨和武器扩散搅扰得心神不定的西方大国,迫不得已与俄罗斯进行合作。但是理念与地缘政治利益分殊,尤其是内部体制演进方向与西方的日益趋异,又使得它们对俄罗斯的未来耿耿于怀,于是,就有了以“颜色革命”一类手段对俄罗斯进行旁敲侧击,以期实现遏制与弱化目的的一幕幕活剧。

如同俄罗斯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较量将不会停止一样,俄罗斯内部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进程,也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为了对上述重大历史进程给予系统的记录与梳理,并从我国学界与国际学界相互交流与比较的角度之下深入地进行研究,《转型时代丛书》不光集中了国内从事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国际政治等多方面资深学者长期研究的成果,而且跨出国门,邀请了一批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参与,其中包括经济学家、现任俄罗斯总统私人经济顾问的安·尼·伊拉里奥诺夫,俄罗斯经济部前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叶甫盖尼·雅辛,还有美国最为活跃的研究俄国问题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安德鲁·卡卿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艾伦·林奇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学者克里福德·G. 盖迪等人。

像这样对俄罗斯转型及其对外关系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囊括了这么多一流学者和优秀中青年专家的参与,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国内学界都是一项新的、同时也是无比艰辛的探索。但愿这项成果的问世,能够引起国内外同仁对转型问题的更多关注和更为深入的研究。

前言

转型期俄罗斯国内政治的演变,大体上体现了一种从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向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转变的总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苏联政治改革的进程,经过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逐步演变,俄罗斯已基本实现了从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向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的转变,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自由选举和思想多元化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俄罗斯的现政权从根本上已不同于推行了70年之久的苏联传统的一党集权的政治模式。

应该强调的是,转型期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充满着激烈的斗争。由于俄罗斯的转型是以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如此巨大的变化势必要引发错综复杂的矛盾,势必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激起巨大的震荡。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始终贯穿于俄罗斯的转型时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造成了十分明显的社会和族群分裂,左、中、右三大政治党派,各有其群众基础,它们依据各不相同的政治理念,提出各不相同的治国纲领和政策主张,围绕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以及国家的内外政策展开激烈的斗争。虽然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势力始终未能取得执政地位,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总体发展趋势也没有被扭转,但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政治体制转型的进程和方向。

因此,俄罗斯国内政治的演变历程,尽管从总的发展脉络来看,表现为一个以西方政治模式取代苏联传统政治模式的过程,但在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特定的历史发展水平的环境下,这个过程表现出相当大的复杂性,西方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既相互融合、共生,又相互拒斥、博弈。政治文化传统几近恒久的特征一直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俄罗斯在转型时期政治上的失范和无序状态又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向传统的进一步偏转和回归起了推动作用。因此,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表现出了一种权威主义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即现端倪,叶利钦时代则确立了“超级总统制”,而普京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为,更是被视为俄罗斯国内政治向权威主义回归的重要表现。

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政治转型表现出的以权威主义为导向的发展趋势,某种程度上正是 90 年代俄罗斯政治领域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的产物。普京正是在俄罗斯人呼唤

因此,西方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在形式上已经得到建立的俄罗斯政治民主制度,“在机制上并没有得到巩固,更没有真正在人们的心目中生根”,因而,“俄罗斯民主制度的质量是令人大可怀疑的”。即便是那些从总体上看对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与成果持较为肯定态度的学者往往也认为,进入 90 年代后,在俄罗斯出现的民主制度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度的更替绝不像人们换穿一件外衣那样简单便捷。因为在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政治经济体制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其基本制度框架是由各个领域无数个大小不等的具体制度所构成的,社会的转型必须以具体制度的更替作为基础,而改革一旦深入到具体制度的层面,必然会遇到各种利益(或权力)的调整和再分配,必然会遇到新旧观念的碰撞。加上制度改革还必须考虑国内外的环境,这一切,都使得俄罗斯国内政治转型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

这种复杂的形势,尤其需要领导人具有坚强的决心和充足的智慧。因此,对转型时期俄罗斯领导人执政行为与方式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成败得失与俄罗斯领导人的执政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普京,政治领导人在社会的变革循环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社会力量对比与社会政治变化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判断与行为。通过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普京在执政的环境因素、心理因素、领导方式、意识形态以及政策方面的比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俄罗斯社会的变化。

总之,从俄罗斯十年社会转型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简单地论断非欧美文明背景的国家经过制度变迁能够成长为欧美型市场经济与民主国家的这一判断是缺乏根据的。体制转型过程要远比任何非社会系统的输入或输出复杂得多,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与相互适应也许才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

全书结构如下：

总论：制度转型与范式转换——以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为例

第一篇：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变革：

第二篇：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物与政治文化。

总论由冯绍雷完成,袁胜育协助整理。